

宋庆龄帮助斯诺赴陕北

朱少伟

1928年夏，斯诺远涉重洋抵达上海，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原打算作短期停留，但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决定先落脚中城再寻找机会去各地考察。在黄浦江畔，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遇见中国许多知名人士，其中宋庆龄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使他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走上了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艰辛征途。



宋庆龄与斯诺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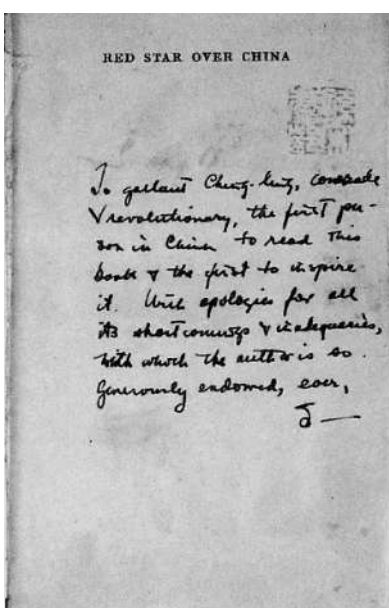
半张5英镑的钞票

1931年9月，斯诺应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拟撰写宋庆龄传略，为此请求她会见。宋庆龄安排“在静安寺路（按：今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与他第一次见面。斯诺曾回忆：“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斯诺多次奔赴前线采访，及时向世界披露十九路军抵抗日军进攻的消息——“中国人在战火中苏醒了”。斯诺在一篇报道中记述：“当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转向革命，拒绝将该市让与日本人时，宋庆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交通大学筹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国际医院，并且招募了一些妇女准备被服、床单、绷带等物，还把自己的住宅当作仓库，每天都从那里发放这些物品。”

当斯诺逐渐了解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世人称道的红军，看到了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走向光明之希望，他决心“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冲破封锁前往采访。1936年春，斯诺专程由北平（今北京）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7号），拜见宋庆龄，请求给予帮助，“以便到红军地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是被当作间谍”。不久，宋庆龄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获得中共中央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的信息；她将此告诉美国医生马海德时，说：“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随后，宋庆龄安排董健吾（中共党员）在西安护送两人赴陕北。

斯诺曾回忆：“通过她（孙夫人）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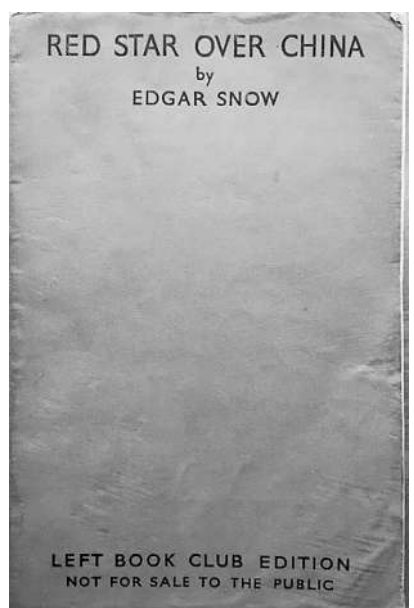


当年，斯诺赠宋庆龄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扉页题签

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董健吾在一份资料中则说：“宋副主席又要我再赴陕北，护送世界日报记者斯诺和美籍医生马海德至瓦窑堡。她马上函约他们由北平至西安，并请我先到那里等候他们，叫我化名王牧师”“我到西安招待所住9号房间。我在那里等候了三天，果然有两位外国朋友叩门而入。我去接待他们的时候，斯诺问我是否是王牧师，我告他是。他即将宋副主席给他们的那张剪开的卡片（按：据马海德回忆是半张5英镑的钞票）交给了我，我也取出她给我的另一半张，对照之下，完全符合。于是我们坐下畅谈”。由此可见，宋庆龄为斯诺、马海德顺利赴陕北作了充分的考虑。

“此书的第一位读者”

1936年7月初至10月中旬，斯诺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位访问红色苏区的国外记者，一共做了16本笔记、拍了24个胶卷，大量文字和照片不仅是珍贵资料，也见证了他从求真相到求真理的转变。斯



1937年10月，在伦敦印行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扉页题签

诺返回北平，马上奋笔疾书，将毛泽东在保安（今志丹县）与他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一些英文报刊。11月14日、21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分两期发表斯诺的《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登载他所撰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完稿；10月，该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引起巨大轰动，成为连续加印的畅销书。

同年8月，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9月，斯诺来到硝烟弥漫的申城，为英国《每日先驱报》进行战地采访。11月，斯诺收到从伦敦寄来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他将这本书赠给宋庆龄时，在扉页恭敬地写着：“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有不妥之处请见谅。”上海沦陷后，斯诺参加过“星

二聚餐会”。卢广绅（中国工合运动先驱）曾回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二聚餐会’，在沦陷后的上海做一些救国工作。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上海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文化界有韦恂、胡愈之、郑振铎”“一次聚会上，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那时，胡愈之看到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就希望尽快推出该书的译本；斯诺很高兴，随口说了件趣事：其实该书原名《Red Star In China》，印刷厂排字工人误将“in”排成“over”，如此一来，表达的意思反而更鲜明。

《西行漫记》的力量

1938年初，胡愈之与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吴耀宗、陈鹤琴、张宗麟、孙瑞璜、王任叔、冯宾符、胡咏琪、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集会在上海筹建复社。复社作为由共产党人发起创办的出版机构，在2月出版的第一本书即为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了便于流传将书名译成《西行漫记》，并增加英文版中所无的不少珍贵照片。胡愈之曾这样回忆《西行漫记》出版过程：“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

复社推出的《西行漫记》，第一版印2000册，很快售完；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在中文初版序言中，斯诺激动地表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许多有志青年奔赴陕北或投身抗日战场，如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时为银行职员，阅读该书后毅然去下“金饭碗”，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陕北，他曾说“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今年，是复社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85周年。回眸昔日宋庆龄对斯诺的热忱启迪和帮助，令人感动。

（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老舍的遗憾

王剑



老舍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的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让人印象深刻。但老舍也有遗憾，就是他有几部长篇小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与读者见面。第一个原因是老舍的主动放弃。1929年夏，老舍在游欧回国途中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大概如此》，一共写了4万多字。但后来老舍却毅然抛弃了这部作品，没有继续再写下去，据老舍自述：“文字写得并不错，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目，设若我还住在欧洲，这本书一定能写完。可是我来到新加坡，就看不起这本书了。”

第二个原因是毁于战火。长篇小说《大明湖》约20万字，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作品以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为背景，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愤慨。小说完稿后，老舍投给了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小说月报》。《小说月报》拟在“新年特大号”上开始连载，并为此事先发了预告。谁料想，“淞沪抗战”爆发次日，日寇即派飞机轰炸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

书馆”总部及编译所、印刷厂、库房等。这部长篇尚未与读者见面，便连书稿同时毁于日军炮火之中。

第三个原因是老舍被迫停笔。1937年，老舍在青岛，平均每日写2000字。他赶写的长篇小说《病夫》和《小人物自述》，拟在天津的《方舟》和上海的《宇宙风》上连载。两篇共写了10万字，一篇3万，一篇7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然而，老舍却停了笔。不愿再写下去了。他在《这一年的笔》中这样解释：“刚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

最后一个原因是来不及创作。1966年4月底，老舍在与他人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已考虑成熟，计划要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创作3部历史小说。可惜这3部长篇小说，除第一部《正红旗》下仅仅完成了前11章之外，其余两部作品均未动笔。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确实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李公朴勇救少年

刘兴尧



李公朴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民主斗士，爱国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艾思奇出去散步，看到一个小男孩气喘吁吁地向他们跑来。

李公朴赶紧拦住男孩，问他为什么跑，男孩说后面有拿枪人追他，他打死了那个拿枪人的狗，那狗咬死了一个中国小孩。李公朴一听，这孩子是见义勇为啊，来不及多说，李公朴顾不上散步了，就带着男孩，从另一条路绕到了书店，避开了拿枪的人，男孩得救了。

到了书店，李公朴安抚男孩，说这里很安全，那人不会追来的，还拿来吃的给他吃，小男孩吃着东西，渐渐地放松下来，李公朴就问事情的经过。小男孩说他是山东人，到上海来投奔舅舅，今天出去玩，在公园门口看到几个人在哭，原来是巡捕的狗咬死了一个小孩，小孩的家人

在哭。小男孩一怒之下，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巡捕的狗又来咬他，被他打死了，因此巡捕就拿着枪来追他。他就跑，正好碰到李公朴救了他。

李公朴一听，也非常愤怒，在中国人的地盘，公园还不能随便进，而且，巡捕养的狗咬死中国人，还没处说理去，难道巡捕的狗命比中国人的人命贵吗？李公朴一生都在践行：为了让后代无灾难地成长。因此，对于小男孩，他是越看越喜爱。

李公朴就关心地问小男孩有没有受伤，小男孩说没有，李公朴就笑着问：“你能一指头把恶狗点倒，看来你会武功啊？”小男孩就说他家乡有好武之风，他也是从小习武。李公朴接着问他，你喜欢看书吗？小男孩说喜欢，李公朴便拿了3本书送给他，并叮嘱小男孩，这书千万别被人看到。

陶行知坚守招生规则

张雨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经典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是这一名言的践行者，他自己就是一位“真人”！他严格坚守招生规则，对所有考生都一视同仁，在他这里没有特权生，也没有“优生”。

1917年秋，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时，主管新生招生，他高度重视招生工作。在学校召开的招生大会上，他对负责招生的老师特别强调：每一个招生的工作人员都要高度自律，洁身自好，绝不允许出现违规招生的情况，绝不允许有“特权生”的出现。招生是一件大事，因为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我们要经得起考验，抵制住诱惑，决不能做出对不起家长和考生的事情。一定要坚守招生规则，让每一位家长和考生都对我们的招生工作有口皆碑、心服口服。

招生开始后，一官宦子弟落榜后，给陶行知打来电话说情，陶行知二话没说，决然拒绝。该官员不死心，第二天派其秘书前来求情。陶行知一脸严肃地告诉对

方：“敝校招生，一向按成绩录取，否则，就失去了准绳。今年没考上，就要下一番工夫，明年说不定就能考取。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目的，而不是通过交易来达到目的。我们要按规则招生，谁都没有权利违规招生。”

看到陶行知毫不松口，秘书便拿出了“撒手锏”：“陶先生年轻有为，又有留洋学历，只要在这件事上给个面子，今后定能平步青云。”说罢，就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银票，然后满脸堆笑地递上：“这是我先生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望陶先生笑纳。”见此，陶行知哈哈大笑道：“我背一首苏轼的诗给你听吧：‘治学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请你回去告诉你的先生，恕行知不能从命。”秘书见无望，面带愠色，从桌上拿起银票，悻悻离去。

消息传开，陶行知坚守招生规则的品行，得到了所有家长和考生的高度赞扬和一致好评，同时，再没有人登门找陶行知说情了。

黄永玉：老顽童的“顽”与“不顽”

游宇明

黄永玉是个做事随性的人：50岁考驾照，80岁上时尚杂志封面，90岁又办个展，93年还敢弄个法拉利过把开车瘾。他爱养狗，家里的冰箱装满了骨头。2014年5月17日出席北京798艺术区“黄永玉的文学行当”专家论坛现场，90岁的他竟然穿了一条时尚的牛仔裤。

老人说话极好玩。他爱喝酒，便说：“酒是人类第二大快乐，它与人类共存亡，只要一天有人便一天有酒。”甚至说：“喝不喝酒是人和野兽最大的区别。”有人抨击他的国画不是国画，毫无章法，他不以为意，开心地说：“谁要是说我的画有国风我就去告他！”

说话不讲套数，画画同样“不正经”。黄永玉的画最大特点是高度心灵化，想表达一个什么主题，就会将局部画得很“出格”，画的标题也极其有趣。他画一只憨态可掬的

小老鼠在低头寻觅食物，老鼠的肚子很大，尾巴高翘，取了一个题目：《我丑，我妈喜欢》；他笔下的一头母猪，头不长，身子却特别肥硕，画题是《超生大户》；他描绘一只大公鸡趴在窝里大喊大叫，姿势特别夸张，目的是吸引别人的目光，取的标题是《人贵在自知之明，你下什么蛋呢》。这样的画有人情有世态有意蕴，同时也具有高度的娱乐性，随时能引发读者的笑点。

不过，黄永玉的嘻嘻哈哈只是其外表，就本质而言，他又是一个非常具有正向价值的人。年轻时，某保长欺侮了黄永玉两个画版画的朋友，其中一个老婆被侮辱，另一个被抓了壮丁。得知消息，黄永玉二话没说，找机会狠狠地修理了保长一顿，然后逃离了那个地方。晚年，央视10频道《大家》做过一期有关他的专题节目，

主持人问及当年黄老被红卫兵一次抽了224鞭，他如何想时，黄永玉居然立即“斥责”：年轻人真不懂事，被人家那样打，我又不能还手，还能想什么？其内心像孩子一样真诚。

有些人手中掌握了一点资源、有点小名气便开始自恋，希望生老病死都被人当作头等大事，觉得这样才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黄永玉不是这样。对于自己的身后事，黄永玉明确说“不留骨灰”，“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自由得多。不要固定埋在一个地方”，朋友想他的时候，就“看看天看看云嘛”。并通过律师立下遗嘱，在他离去之后，任何人不得办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不许其家人支持、参与其他人组织的纪念活动。

黄永玉更使人感动的是他对家乡的那份深情。2010年春节，年近

九旬的黄永玉在北京万荷堂家中不小心摔了一跤，凤凰的家人赶去看他，在一次聊天中说：“新建的（凤凰）县高级中学，孩子们过沱江非常不方便。”说者无意，听者却上了心，黄永玉萌发了在沱江上修桥的念头。他用心画了“风、雪、雨、雾”四座仿古风雨桥，并于当年11月回到凤凰，承诺“这四座桥全部由自己卖书画筹资，不花县里一分钱”。仿古风雨桥2011年动工，2012年建成，总投资达1100万元。如此的事，黄永玉在老家还做了许多，比如除了沱江四桥，他还捐资修了吉首六桥，总花费4500万元；筹资建立了吉首美术馆；捐资数百万元给母校文昌阁小学进行相关校园建设。

黄永玉的“顽”与“不顽”是高度统一的，“顽”见出的是性情，“不顽”显示的是操守。

蒋兆和笔绘“抗美援朝”

周惠斌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掀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伟大战争的序幕。不久，全国文联发出“文艺界开展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要求美术家们用自己的画笔参与抗美援朝的主题创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关心国家安危，他在第一时间，积极投身到以美术创作响应和支持“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他打破传统国画表现旧式文人小情小景的桎梏，将自身的创作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先后完成了《鸭绿江边》《把学习的业绩告诉志愿军叔叔》《给爷爷读报》《两个母亲一条心》等一批具有现实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通过两位少先队员向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叔叔报告学习成绩这一寓意深远的故事内容，表达了“祖国的花朵”对“最可爱的人”的感谢和敬爱之情。画面上，一名少先

员以虔诚的神态看着另一名少先队员拿着毛笔认真写信，展现了她们对朝鲜战场上英雄们的崇高敬意和无限爱戴。虽然画中并没有直接描绘战争场景或刻画战士形象，然而国内的少年儿童在安宁的日子里用功学习、放飞白鸽，他们的恬静、甜美，成为召唤志愿军英勇战斗的无穷力量。《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后由齐白石亲笔题写上款，入选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蒋兆和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与阎文的《我们热爱和平》这两幅画作，后来被制作成宣传画，广泛张贴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挥机关、野战医院、包扎站等处，并且收藏在战士们们的行装和前沿坑道内。其中，《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单幅印刷近30万张，许多志愿军战士随身携带，由衷感受到祖国花朵对他们的关切和信赖；甚至在战斗前，他们还面对画作宣誓：“为了保卫祖国和平，我们与美帝决一死战，直至最后胜利！”